

評《酷兒同志：中國後社會主義 時期的同性戀身分與同志政治》： 酷兒也是同志，同志也是人民

江河清（美國美利堅大學人類學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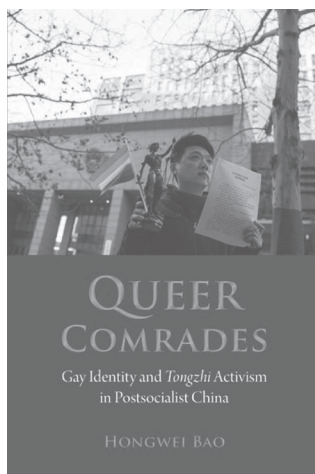
書名：*Queer Comrades: Gay Identity and Tongzhi Activism in Postsocialist China*

作者：Hongwei Bao（包宏偉）

出版年：2018

出版社：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圖一：*Queer Comrades*書封



資料來源：Nordic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提供

英語的 queer 原本是羞辱的用語，描述他人不正常、怪裡怪氣。然而，近代性別研究者和運動者逆向肯定 queer 的怪異，以 queer 為批判的概念，檢視或質疑社會常規秩序，近來也有性少數直接以 queer 作為身分認同。然而，還是有比較年長的性少數因為羞辱的記憶，不能接受 queer 作為身分認同。我常用的英文編修軟體至今仍會提醒我 queer 是個冒犯人的詞彙，建議我修改用字。

對於 queer 一詞的理解差異，反映的其實是知識系統的差異。英文的 queer 一詞歷經世代、社群意義的轉變，語詞的歷史也難以被翻譯。華語學術圈以「酷兒」翻譯並引介 queer 的概念，從一開始就強調其批判面向，具有正面的進步意涵，而非罵人的髒話。對於華語的學術和性別運動社群來說，我們只是在知識上同情和理解英文 queer 的羞辱記憶。以台灣性少數來說，真正具有羞辱記憶與力量的是另一套語彙，例如「娘娘腔」、「人妖」、「不男不女」等。雖然我們還是可以說「酷兒」的翻譯字源是 queer，但此酷兒其實已非彼 queer。以上，我要說明的是，queer 一詞沒有貫穿時空、統一性的情感與意義。人們對於 queer 或酷兒所主張的意義，以及對特定語詞所產生的情感，都是社會和歷史的產物。人們不是只有被動地接受給定的文字意義，語言使用者也有賦予語詞新意義的主動性。

一、「同志」概念的歷史變遷：國族、社會主義與性少數

如同 Queer / 酷兒的歧異，包宏偉在《酷兒同志》一書所討論的「同志」概念，也強調其歷史和社會語境。作者沒有直接給「同志」下定義，而是將「同志」視為意義不明確、不固定的「空符徵」，人們根據各自的社會關係、歷史記憶等，賦予「同志」一詞特定的意涵

(Bao, 2018: 65-68, 202)。「空符徵」的概念要我們去檢視符徵以外的各種力道和條件，共同勾連出符徵的意義。作者認為，「同志」也可以看作是一套論述或主體位置，「同志」的意義是在特定社會情境底下的人們「活」出來的 (Bao, 2018: 7)。整本書所討論的「同志」，都是在這個認識框架下發展出來的。

根據這個邏輯，我們可以推論，不該把所有華語社群談的「同志」，都當成同一種「同志」。推翻滿清帝制的同志、社會主義的同志、性少數的同志都不是同一種同志。即便是在同一個歷史時間裡，人們所稱的「同志」也未必是同一種同志。

在近代中國史，「同志」一詞有多重意義和歷史轉變。同志曾意味著反抗封建、帝國、殖民的現代中國性，孫文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是經常被引用的名言 (Bao, 2018: 69-70)。在共產革命的脈絡底下，同志的概念延續革命的政治意涵與情感，同時接連到共產主義下的「人民」意義，強調階級平等的社會關係 (Bao, 2018: 70-72)。在這些歷史過程中，「同志」的概念投射出現代中國國族的「想像的共同體」。一直到1980年代，中國官方都以「同性戀」稱呼同性性傾向者，這個用詞不只是病理化的性少數，也是法律管制的「流氓罪」範疇 (Bao, 2018: 73, 178)。以「同志」稱呼性少數，其實是非常近代的語言轉變。

二、同志與人民

作者指出，在1990年代之後，香港學者、運動者、藝術工作者開始以「同志」統稱性少數，作為性身分範疇的「同志」概念首先迅速在中國以外的華語語系社群（尤其是台灣）廣泛流通，並在中國普

遍化，成為性少數意義的「同志」（Bao, 2018: 76-77）。作者在書中反覆指出，在後社會主義的中國，作為性少數的「同志」概念密切延續「人民」的歷史意涵。

舉例來說，強調馬克思主義精神的電影工作者崔子恩，在影像美學和電影生產過程中都強調「人民」概念的平等社會關係與連結（Bao, 2018: 第5章）。作者跟隨電影和同志運動工作者辦巡迴同志影展時，也強調把電影和同志相關的知識帶給「人民」的初衷（Bao, 2018: 第6章）。同志與電影工作者都認為看電影是具有啟蒙意涵的活動（Bao, 2018: 165），一起觀看同志電影，也是一種同志運動。看電影的集體活動，不但是在平凡的公共空間創造性少數的意義，看電影也為參與者創造社群歸屬感和自我認同的精神空間。最後，當性少數與警察在公園裡發生衝突時，他們主張同志也是「人民」，可以使用公園的空間；在此，社會主義的「人民」概念成為性少數對抗警察的論述資源（Bao, 2018: 第7章）。

雖然作者在書中只有討論「同志」作為一個空符徵，但我認為「人民」的概念是這本書另一個關鍵的空符徵。近代中國國族主義和共產主義界定了「同志」和「人民」的意義與概念關係，性少數則接收、再界定「同志」和「人民」的概念。對性少數而言，人民的概念包含了性少數的「同志」，並進一步主張其性公民權。這樣的討論方式呼應台灣同志運動用「人權」論述同志是正常的人，推論同志的平等公民權；在此，「人權」是台灣社會的關鍵空符徵。然而，如同作者指出，「人權」的概念在中國具有冷戰對立的歷史意涵，因此同志運動討論或訴求不會用人權討論同志議題（Bao, 2018: 179）。

三、「同志」的歧異與意義的生成

這本書對於「同志」作為身分認同的討論，呼應學界對於認同政治的批判。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先擱置同志或相關語彙的意義，再對比語言和經驗差異，分析各種「同志」意義生成的邏輯與條件。這樣的研究討論顯得龐雜，但我認為這樣的龐雜，就是認同政治的真實。

對比同志、gay、同性戀這三組詞彙的差異，作者指出因為世代、階級、遷移、全球化影響，性少數選擇使用不同的身分認同語彙，藉此區隔性身分差異（Bao, 2018: 第2章）。作者關注人們如何闡釋或體現這些差異，並藉由分析差異的邏輯，了解性身分與全球化、遷移、資本主義、消費主義等的交錯關係。「gay」的認同暗示其全球都會連結（Bao, 2018: 47-49），「同志」則強調負責、不淫亂、高素質的新公民身分（Bao, 2018: 53-55）。「Gay」和「同志」的身分概念在強調階級、世代、城鄉差異的同時，也區別出「同性戀」及其汙名連結（Bao, 2018: 55-58）。此外，作者也指出由於國際資金挹注以男同志為主的愛滋防治計畫、同志與酷兒運動路線的辯論，以及政府管制等影響，性少數社群也在運動辯論中，不斷重新定義同志的概念（Bao, 2018: 83-91）。

值得注意的是，當香港性少數運動者和學者開始使用「同志」一詞時，有人抱持遲疑的態度，顧慮「同志」概念與共產主義和中國大陸的歷史關係（Bao, 2018: 74）。作者在第五、六章討論媒體和同志運動時，提到電影工作者崔子恩和范坡坡在運動上會直接說「我們要看同性戀電影」（Bao, 2018: 131, 148, 156），但在舉辦活動時，為了通過政治審查或避免干擾，策略性地使用更具學術性的語言，包含將「同性戀」改成「酷兒」，將「電影節」改為「影展」（Bao, 2018:

155)。再一次，作者提醒我們，同志、酷兒、gay、同性戀等用詞都必須脈絡化地理解，才能了解特定群體在特定時空條件下，語言使用的知識觀和行動邏輯。

四、研究對話、限制與延伸

我想提出幾點這本書的研究對話與限制，以及可以再進一步推展的部分。在英語語系的性少數研究和運動中，一直都有 queer 其他身分認同範疇的辯論。然而，關於 queer 是什麼，或者 queer 可以做什麼，以及 queer 和其他性少數身分範疇的關係，學者、運動者、社會大眾都在不斷辯論和重新界定。包宏偉的《酷兒同志》一書連結了英語學術社群的酷兒研究，呼應酷兒學者對於認同框架的批評，藉由「酷兒同志」的視角，檢視歷史、政治和社會變遷。

《酷兒同志》一書在研究方法上綜合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包含歷史考證和質性訪談研究，研究分析並兼顧歷時性的社會變遷和同時性的社會差異。儘管如此，我認為仍有許多重要的差異面向或因素有待進一步檢視，例如族群、城鄉與世代。如同作者已意識到的研究局限，本書的研究是在大都會地區進行，亦即中國的一線城市，研究參與者也普遍具有高等教育背景（Bao, 2018: 15-16）。這本書強調馬克思主義的酷兒／同志理論立場，研究對象卻是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地區，以及階級地位較優的一群人，而且可能是以漢人為主要研究群體。

再者，這本書關注的許多主題，也是台灣同志研究長期關心的題目，例如：語詞的在地化和歷史變遷、翻譯的公共性，以及同志運動和認同政治的關係。雖然書裡偶爾談到台灣，但普遍僅限於描述性資

料或歷史事件，而非理論性的對話對象。身為一名台灣讀者，我認為這本書強調歷史軌跡和知識系統對於同志運動的影響，可以幫助台灣讀者理解在中國歷史、社會情境底下的「同志」概念，再回過頭思考台灣的同志議題。另一方面，中國同志研究者也可以參考台灣研究，並與其他華語語系的同志研究進行理論性的對話。

除此之外，部分章節仍有待進一步分析或說明。例如，第五章提供一系列對於電影工作者崔子恩的親近觀察，詳細指出崔子恩的特殊性或酷兒性，包含他對於認同政治的批判，以媒體為運動策略，不求完美的影像美學，以及反資本主義的理念和實踐。然而，我認為這個部分的討論可以更超越崔子恩個人身為一個重要人物，或者透過他的理念和作品，更進一步分析酷兒、同志與社會的關係。此外，作者討論同志電影的生產和觀看經驗（Bao, 2018: 第5, 6章），除了公共性與集體認同的面向之外，還可以進一步探討其中發生的倫理關係。

作者在第四、六章中，談到西方性知識對於當代中國同志的影響，但討論只停留於歷史事實介紹，並未更進一步分析特定知識的在地化。舉例來說，第四章討論性傾向扭轉治療，但未檢視特定的醫療知識如何被選擇性地引介和在地化。這一章和其他章節的關聯，也需要再進一步說明。第六章提到電影節的活動經費，主要來自國際組織的愛滋防治資金，電影節並播放中國同志導演在美國舊金山拍攝的紀錄片，但作者卻只強調中國同志運動和電影工作者拍電影給中國同志看的面向。在這些討論中，中國同志隱約又成為被動的、特殊的他者。相對於這本書前面章節強調近代中國與全球歷史對於中國性少數主體的影響，關注在地主體與全球化的經濟、政治、文化互動等，書本後半的討論卻越來越強調在地的特殊性和主體性。

最後，我要推薦這本書給關心性別和中國研究的讀者。這本書雖

然談了很多「同志」，但並沒有把「同志」視為語言上的東方奇觀，作者的關注圍繞著「同志」的歷史和社會因素。這本書適用於大學通識以上課程，尤其是第二、三章對於同志相關概念的討論。作者同時分析歷史材料、比較質性訪談資料，也提供跨學科研究的參考範本。

參考文獻

Bao, Hongwei (2018) *Queer comrades: Gay identity and Tongzhi activism in postsocialist China*. Copenhagen, Denmark: NIAS Press.

◎作者簡介

江河清，美國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人類學博士班候選人，主要研究領域包含酷兒理論、批判種族理論、遷移、亞美研究、認同政治。博士論文主題為亞裔美國酷兒研究，探討種族、情慾、階級、宗教、公民身分等因素交織的結構性壓迫，以及相對應的認同政治與行動邏輯。除了美國的有色酷兒研究，同時關注台灣社會運動，尤其是性別相關議題，並以公共評論寫作參與社會對話。

〈聯絡方式〉

Email: hoching.jiang@american.edu